专 题 综 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西方关于当代资本主义若干问题的争论

徐觉哉①

资本主义在欧洲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 500 多年的历程,但是今天它还处在不断的演变和扩展之中。这种变动过程不仅体现为资本主义内在价值和基本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同时还表现为以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价值和社会结构为底蕴的制度模式的形成。到了 90 年代，资本主义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环境：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结束，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原来的制度对手和意识形态敌人；以电脑的广泛运用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多数国家的经济政策都实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调整，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组织大力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从而促进了资金、技术、人员等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对于这个新资本主义的若干新现象、新模式、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多年来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深入的实证研究，并在这一基础上作出了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和创新，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关注。

一、当代资本主义处于哪一发展阶段？

本世纪 70、80 年代以来，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被西方学者以各种方式加以描述，一些人强调文化的变化，另一些人则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于经济的演变、生产与市场的

①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变化、或者企业组织与金融组织的调整。这些描述首先考虑的是新技术、新的通讯交往方式、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络、信息高速公路等，同时又提出了一些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观点。近一时期，在西方的书刊中频频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关于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看法：

1.“后资本主义”论

这是美国资深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在 1993 年问世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提出的新概念。他在肯定知识已取代传统的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等，成为最关键的生产要素后写道：“这一改变已使我们的社会成为‘后资本主义社会’。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它创造了新的社会动力，它创造了新的政治学”。据他估计，这一社会要过渡到 2010 年或 2020 年才能完成。

在该书中，他从社会、政体和知识三个方面，描述了这个新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国家职能的变化以及国家之间新的组织、结构的建立。在他看来，在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控制资源和决定性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或劳动力,而是知识,它同时又是一个多组织的社会；发达国家通过生产力革命、管理革命而进入知识社会，那时社会的阶级划分已不再是“资本家与无产者”，而是‘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资本家已从“顶峰上下降,被职业经理所取代”；养老基金而不是老牌资本家“日益控制了金钱的供应和分配”；在政体上，民族国家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40 多年中“逐渐失去了作为唯一权力机构的地位，代之以特大国家和多种跨国的、地区的多国组织”。

2.“新资本主义”论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曼纽尔·卡斯泰尔被广泛认为是网络社会最优秀的思想家。他认为，信息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意味着一种“新经济”的诞生,资本主义也因此在作结构性的调整。由于信息技术和网络在企业内和社会上占据了显著的位置，从而引起了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这使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他说：“资

本主义正在被强化。一种带有个体色彩的、分散的资本主义正在诞生。通过因特网，所有人都可以成为资本家。硅谷的发展模式预示了这种趋势：大部分报酬是企业的优先认股权和股份，更多的雇员感到自己是股东，而不是单纯的薪金领取者。如果他卖掉手中的股票，他马上又可以很容易地在网上进行新的投资”。

这种“新资本主义”论，把新技术特别是因特网的功能神奇化了。当被问及在这种‘新资本主义’背后，是否‘也存在着一种很严酷的东西’时，卡斯泰尔也承认“新经济确实在加深人们之间的鸿沟”，一些人拥有个人资本，受过相当水平的教育，他们有能力挣钱；另外一些人没有这种能力，因而他们只好置身于游戏之外。当然，他在说到这两种人时，极力回避他们之间的阶级关系，把他们说成是‘自己通过网络进行投资的人’和‘把钱存入银行的人”。这显然是一种十分模糊的说法。

3.“超资本主义”论

作为大型会计和咨询公司普华会计师事务所的战略咨询负责人，格雷迪·米恩斯和戴维·施奈德近期合写了一本名为《超资本主义》的书，试图预测和衡量因特网给企业界带来的一些变化，同时把在因特网所释放的强大经济力量推动下上升的市场称之为“超资本主义”或‘靠刺激发展的资本主义”。

两位作者在书中指出，因特网的发展已经迫使一些旧的企业模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美国思科系统公司为例，如今这家公司销售的大部分产品都不是它自己生产的，当客户向该公司订购一件商品时，订单很可能直接转到思科供应网中的一家公司。该供应商而不是思科会交付订单上的产品；思科所做的就是给客户开帐单，向供应商付钱，然后把差价装进腰包。这种通过把外面的公司融入自己的供应网，并发挥自身的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做法，米恩斯和施奈德把它叫做‘非资本化’模式，即不需要花费巨大的有形资本。思科公司成功的基础，也就在于它摆脱了作为设备制造商的传统角色，而采取了这种非资本化的、拥有品牌的模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超资本主义的秩序下，这些公司日益偏离自给自足的做法，把更多的职能分包出去，建立有效的、以因特网为基础的供应商联盟，从而取得了极高的价格一收益比。随着公司越来越多地放弃生产而把全部精力集中到设计和销售产品上，许多人担心会“挖空经济”，然而在他们看来，这恰恰是先进国家的后工业化秩序。

4.“跨国资本主义”论

这是美国学者罗伯特在《跨国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的概念。“跨国资本主义”是一种非组织的资本主义，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官僚制大公司资本主义不同,实行‘元生产”,其特点不同于大资本主义公司的集中生产，而是分散生产，如一部汽车，其零件来自全世界各地，因此很难确认它的国籍。这种“跨国公司”不同于“多国公司”,只为资本服务,不为国家服务。“元生产”不是通过商品赢得市场，而是通过设计新的服务方式，追求高附加值。生产的关键不是资本而是智力。跨国资本主义并没有消灭两极分化，相反扩大了两极分化。日本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从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领域退出，进入追求高附加值的服务行业等泡沫经济领域，牟取暴利，这恰恰表明了资本主义的本末倒置，趋向衰落。

5.“股东资本主义”论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刊载了题为《欧洲的新资本主义》一文，提出了“股东资本主义”的概念。作者认为，过去的垄断公司在资金来源上依赖于大银行，因而企业要受银行的支配。现在企业则主要通过证券市场获取资金，银行成了公司的股东。除银行以外，普通的居民也纷纷购买了股票,1999 年德国股票持有量平均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 22%，而在英国这一数字竟高达 82%。这一变化的结果，一是增强了股东的地位和作用，使新一代管理者脱颖而出;“他们明白,公司属于股东,而不是老板和社会”;二是公司之间争夺激烈，因为从证券市场上筹措资金，实际上就要听从市场的安排。作者在文章结尾写道‘这种‘股东资本主义’将会更加透明,更加高效，“股东权威的增强，有再造欧洲资本主义的希望”。

今天，这些西方公司的大股东有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和国家，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个人，主要是亿万富翁和高层经理，他们也是大股东。一项统计资料表明，美国 90% 的个人持有股票被 10% 的最富裕的家庭所持有，只有这些大股东，才是企业的真正主人。当然，小股东人数的大量增加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但它无论如何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股东资本主义”与过去盛行一时的“人民资本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6.“赌场资本主义”论

这一概念是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在《赌场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的。在她看来，现在西方的金融体系已经变得与一个畸形赌场没有什么两样，每天在这个赌场中游戏卷入的资金之大简直无法想象。在世界大城市的多数办公大楼里，房间里满是一支接一支不停抽烟的年轻人，他们都在玩这种游戏。与赌场一样，现在的巨额融资世界给玩家提供了许多可供选择的游戏，除了轮盘赌、21 点或纸牌以外，还可以在外汇市场及类似场所，以债券、政府有价证券或股票进行交易。在所有这些市场里，你可以通过期货交易或买卖期权和所有其他深奥的金融发明，对未来下赌注。在这些玩家中，银行投入的赌注很大，当然也有很多非常小的经营者。有兜售建议提供内幕消息的人，还有向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散布流言的小贩。在这个金融赌场里，总管理员是大银行家和经纪人。

她指出，普通赌场和全球巨额融资赌场最大的不同是，后者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毫无选择地被卷入了每日的游戏中。一种货币的变化可能使农民在收割庄稼前就收入减半、或使出口商停业。利率上升可以导致店主库存费用致命上涨。她认为，现在一些政治领导人表面上似乎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实际上他们推行的一些政策早被政客们所打乱。如美元疲软或太坚挺；利率上升使支付外债利息变成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以致无法承受；银行突然决定不再提供贷款；石油价格突然上升或下降；由于主要消费国的经济正在经历衰退，出口创汇可能依赖另一些商品的价格下降。金

融世界的不确定性不仅波及到了每个人的生活，而且关系到政府的命运，并迟早会影响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以上西方学者从不同的侧面描述和揭示了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一些情况，并提出了他们各自的见解，对我们了解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动向不无启迪。

二、资本主义应采取何种最佳发展模式？

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多元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因此模式间的相互比较也就成了一个热门话题。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和新机遇，西方政界和学术界人士都试图通过对不同模式的比较，来选择一条最佳的发展道路。

实际上，二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世界中就已经出现了几个具有鲜明特征的模式：先行发展的有英国和法国模式，后发赶超的有德国和日本模式，介于两者之间的是美国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和日本的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战略以其产生的良好经济成就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另外，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以及东亚的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也以独特的发展方式和制度建构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瑞典模式的特点是完备的福利制度；东亚模式秉承了日本模式的基本精神，充分发挥了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全力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这两大模式不同于长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样板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因此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不小的争论。

进入 90 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这就为不同价值理念之间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为模式间的比较和讨论开辟了更大的空间，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

美国模式首先遭到了来自亚洲和欧洲的批评。欧洲的批评所依恃的是欧洲发达的福利制度和能够照顾到包括雇员在内的更广泛利益集团的公司治理结构，即所谓的利权入结构。出于这种原因，欧洲人士是把美国模式称为野蛮的资本主义，而其中法国人米

切尔·阿尔贝的《资本主义对抗资本主义》一书是这种批评的代表作。他在书中指出，以市场和个人为本位的美国模式忽视了社会的整体利益,使经济沦为一种‘ 赌场经济 ”,结果造成了充足的物质与贫乏的精神的背离。随着东亚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人们对美国也提出了批评，日本的石原慎太郎抛出了“ 日本说不 ”三部曲,马来西亚则由马哈蒂尔政府出面。他们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东亚国家重视东亚文化价值和质疑西方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的倾向，反映了他们对自身文化和制度的信心和参与国际对话的平等意识。

但是美国人对亚洲模式也一直质疑不断，但真正给这些质疑提供理论支持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亚洲奇迹的神话》一书，于是东亚模式成了众矢之的。克鲁格曼在文章中指出，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不是基于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而是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继续，即依靠高投资及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大规模转移。这种类似于原苏联的模式，一旦出现投入枯竭，资本与产出比例达到富裕国家的水平，东亚的竞争优势便会失去，收益将减少，增长将急剧放慢。因此，东亚无经济奇迹可言。克鲁格曼的理论出现之后，立即受到了亚洲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克鲁格曼把亚洲经济增长的原因简单化了，没有看到亚洲特殊的制度建构、文化传统以及对国民素质的大规模投资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然而，为亚洲模式辩护的声音被金融危机的爆发淹没了。亚洲危机的出现虽然有其深刻的外部原因，但也暴露了亚洲模式的内在缺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报》记者的采访时说：“ 亚洲模式已经过时了 ”。而以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里兹为首的一批官员却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不能因为亚洲危机就全面否定亚洲近几十年取得的辉煌经济成就以及进行的制度创新。亚洲危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这些国家过早实行的资本自由化措施。

面对来自欧洲的批评，美国也不甘示弱，不断地给予回击，于

是在美国与欧洲之间也引起了争论。这场争论的直接诱因是欧洲经济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明显衰退迹象，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长时间持续偏高，福利制度造成了无效率的庞大政府和缺乏竞争力的劳工。欧洲经济的困境成了 1997 年 6 月西方大国首脑丹佛会议上的重要议题。在会议上，美国总统克林顿多次提出要建立“ 市场主导的民主主义 ”,炫耀美国的业绩,不点名地批评了欧洲模式的弊病。但是欧洲领导人显然对克林顿的“ 牛仔资本主义 ” 感到不舒服，他们认为美国模式带有经济上不平等、不安全的成份，而且难以克服。

法国学者米切尔·阿尔贝在这方面也发表了看法，是很值得注意的。他认为，日本、瑞典等有自己特点的模式都应该和德国一样归属于莱茵模式，而莱茵模式和美国模式构成了资本主义的两大模式。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美国模式强调个人成功和短期的金融利益；莱茵模式强调集体成功、认同以及长期利益。与美国模式相比，莱茵模式有两个特征最为突出：一是经济优先性，二是社会优先性。

但是,现在首先遇到问题的是瑞典模式,有人断言“ 这是一个只愿分配财富而不愿去创造财富的国家 ”。相比之下，德国模式遇到的问题似乎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关于德国模式的前途，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德国经济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它会激发德国各界的创新精神和务实精神；第二种意见认为，应该按照美国模式来改造德国模式，全面改革各种制度；第三种意见认为，要在现有制度框架内进行改革，以更好地发挥德国模式的优势。罗格尔·德韦克的文章集中代表了这种看法。他认为，德国模式的支柱一社会市场经济的三个组成部分已发生了变化。在经济方面，按照原先设计，经济可以同工业划等号，聚集在工厂中的人们需要规则来协调利益关系。现在随着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变,工业组织逐渐消解,网络替代了工厂,工作形式趋于多样化,这样工业时代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应；在市场方面，产品寿命越来越

短，竞争越来越激烈，国家的调节能力已无法适应市场的变化；在社会方面，社会保险越来越昂贵，国家支出不断上升，但财产分配一年比一年不均，失业问题严重。在他看来，这些变化使产生于特定时代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难以适应新的情况，但这不等于说其使命已经完成，只要进行自我革新，仍然有光明的前途。

尽管美国近几年的经济状况非常好，甚至有人提出“新经济”概念，用来描述美国经济充满希望的一面，但是美国模式的一些内在缺陷也已经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注意。布热津斯基在《大混乱》一书中特别列举出困扰美国的 20 个问题。他担心国内出现的社会文化难题会从两方面对美国的地位产生威胁：“一方面，一个基本上由缺少深刻的人口价值理念的、追求物质享受思想所支配的社会形象，总会削弱美国社会模式的全球吸引力，特别是作为自由象征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这一形象总会在全世界多数贫困的广大群众中引起过于夸大的物资期望，这类期望无法得到满足是可以理解的，但期望落空就必然会加剧他们对全球不平等的愤恨之情”。

这样看来，在解决经济增长与就业、福利之间的矛盾时，美国模式主张为维持经济增长而减少福利，以放宽就业限制和工资限制来增加就业，但就业的增加是以贫富差距的拉大为代价的；欧洲模式则把维持高福利放在首位，因而牺牲了就业和经济的增长。显然，这两种解决方法都有明显的缺陷。为了适应时代要求，西方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寻找第三条道路来弥补二者的缺陷。现在这种超越“左右对立”、“兼顾”发展与正义”、“均衡”权力与义务”的第三条道路已经成了西方主要国家中流行的政治口号和社会政治实践，英国的布莱尔、德国的施罗德和美国的克林顿也俨然成了“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发言人和代表。他们认为，国家和社会都要主动地适应整个时代的变化，特别是快速的全球化进程，通过有弹性的创新体制来寻求同时代变化的契合，并改革旧的僵硬的体制。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已成了西方各国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一政治现象已引起了世界性的广泛关注和评价，也为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背景。

三、何谓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及其特征？

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性质，西方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士曾作过种种界定。发达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极力宣扬全球化的超国家性、超阶级性，说它的实质是“无国界的经济”“经济地理的终结”“国界的消失”“国家权威的销蚀”，甚至认为“防务、货币、福利等这些国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基本职能都在消失”。

另一方面，国际上一些左翼人士则把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划等号，认为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膨胀”，是“资本积累的内在驱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曾指出：“全球化不是一种条件或一种现象，而是一种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进程”。美国学者埃伦·伍德进一步指出，目前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全球化这个问题，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正在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制度”。因此，所谓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蔓延，是整个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化”的新进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利用世界市场、经济全球化、商品和资本的输出，来输出本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生产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种本质没有丝毫的改变。因为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仍是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仍由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宰，正是这一现实决定了它的社会属性。

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的戴维·麦克纳利在 1999 年 7—8 月《每月评论》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作为历史的现实：千年末关于资本主义的思考》的文章，他认为，要正确认识全球资本主义，就必须关注它在竞争性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关系中的空间政治形式，因为这些关系会导致体系的不平等，形成力量等级。如有些被纳入世界经济圈的国家，就处在这一体系中的从属地位。在他看来，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本主义仍保留了帝国主义体系，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全球性机构来运作的，而这些组织却为世界上一小部分强有力的民族国家所掌握；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区之外的国家却

受到了大量的限制。他认为，今天国家主权的衰落已是一个极为独特而不平等的过程，它使全球力量不平衡的趋势更加恶化。

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种社会制度，其内在的基本逻辑是一成不变的，但它内部的组织结构却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因而表现出不同的新特征。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伊藤诚在《全球化当中的日本资本主义》中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有如下一些特征：(1)在促进现代经济全球化方面，ME 高度信息技术在给产业基础带来变化的同时，对商业、金融、服务等领域的技术也发生着重要影响。(2)跨国公司在广泛的领域中诞生，提高了在世界范围内的活跃性。目前 2 万多家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已经在世界经济中取得了主宰地位，它们既处于全球经济体系这个巨大金字塔的顶端，同时也通过各种生产网络和金融网络，构建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基础。(3)经济全球化明显地推动着劳动力的国际流动。现在每年大约有数百万人在向富裕国家流动，仅在亚洲这个数字每年就要超过 200 万，并有大约 1 亿人离开出生地去谋生。(4)资金、金融的世界性流动及其相互联动得到了增强，尤其是浮动汇率制引起的货币价值的剧烈波动。与其紧密相连的商品期货、证券、股票、金融衍生物等投机性交易，也引起了国际资金的大量流动。现在国际货币的投机性大约是贸易、旅游等实际需求的 50—100 倍，并通过世界金融中心而流动。可以说，这种金融体系的世界化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重要特征。(5)经济全球化作为意识形态而被广泛利用，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放宽劳动市场限制、对企业和富裕阶层减税、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以及向美国企业结构的方向进行改革等，都被看作是全球化的要求而得到大力推行。

英国女性主义学者吉普森·格拉汉姆则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特征：

(1)统一性。她认为，资本主义有一套统一的制度和再生能力。这个有机体是由资本积累的活力沿着预定轨道加以推动的，

以循环着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劳动的流动反映出来，并根据其内在的逻辑或法律来规范自己。在她看来，资本主义的统一性表现在结构上，这一有机体的各部分、各种功能间相互联系，内外部结构一致地排列起来，从而在结构上具有耐用性、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点。她指出，当资本主义的“长期繁荣”结束于福特主义的危机时，一种后福特主义又取代了福特主义的发展模式，完成一种广泛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重新组合。这个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出资本主义不再是一种没有中心的实践聚合，而是一种结构上和制度上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不仅能消化自身的危机，而且能使国内经济与全球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对这种巨大、持久、自我支撑的统一性社会形态，普通的政治和文化干预是渗透不进去的。

（2）独特性。她认为，作为一种独特的经济形式，资本主义没有真正的相似物。所有的经济形式都缺乏这一制度的一些特性，缺乏像资本主义那样根据其内在的法律就可以再生和扩展自己的能力，原因是资本主义所采取的一切形式都是从其内部自然发展起来的。正是这种独特性，使资本主义自身具有一种再生的特殊权利，甚至能把自身的危机也归为资本主义不断增长和发展的需要。资本主义的这种独特性把社会主义设计的方案推到遥远的和不可实现的未来，因为在资本主义的独占关系中，任何与它不一致的东西都将被边缘化。

（3）总体性。格拉汉姆认为，资本主义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把自己作为整体向社会展示出来，表现出包围、包容性，可以把一切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都囊括进去。这种广泛的网络使人们生活在其中,而不能超越它的框架。银行制度、民族国家、国内生产、媒体文化等，所有这一切都成了资本主义生存的条件。在她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似乎不存在一个兴旺的、强有力的非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空间。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的这些特征即它的统一性、独特性、总体性，使资本主义在新的发展阶段具有

了新的活力。对于资本主义以全球化特点表现出来的扩张性，她们的态度是，在行动上鼓励工人们用国际主义的方法团结起来，共同向资本主义全球化这种超级霸权发起挑战。

四、“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划等号？

人们公认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社会客观规律最深刻的揭示者，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最近西方学术界人士经过考证后，竟然认为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而惯用的是“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资本论》中用“资本主义”也仅仅是这些词的意译。据法国年鉴学派著名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考证，“资本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 1753 年法国的《百科全书》中，含义为“富人的地位”。直到 1857 年蒲鲁东才为“资本主义”下了一个较为贴切的定义：“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和社会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作为收入来源的资本一般说来不属于通过自己劳动使资本发挥效用的人。”

到本世纪初，西方经济学家也一直拒绝在学术讨论中使用“资本主义”一词，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利于客观公正的学术讨论。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行的一场大论战中，主张自由放任的西方经济学家们一时找不到更好的名词来表达市场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于是便勉强使用了“资本主义”这个词。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界，“资本主义”这个词一开始就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即“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与“市场经济”制度划等号的。但是这一点没有被东西方学术界所普遍接受。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古巴、越南等国相继进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西方学者便认为，这种市场经济的胜利即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声称，后冷战时代的到来，证明了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好的经济制度安排。格林斯潘在一篇题为《市场资本主义》的

演讲中认为,20 世纪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验场，最终证明了市场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者也逐渐默认了“资本主义即市场经济”的规约，于是在后冷战话语中“资本主义”这个词似乎是与“市场经济”通用的,越来越丧失其意识形态的色彩。

然而，布罗代尔却不这么认为。他在《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书中,非但不同意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制度划等号,反而认定，在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裂和对抗。他通过对西欧社会经济史的大量实证研究，发现人类社会经济可分为三层结构：底层是人们衣食住行的、无意识的、习惯的日常生活结构,他称之为“物质生活”;在物质生活基础上,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交换网络,即“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之上寄生着“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按照布罗代尔的观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公开的自由竞争，按照公平的原则进行的交换；后者是少数资本家依靠雄厚的资金实力和独占的信息，私下里进行的带有欺骗和不公平的交换，以攫取巨额的垄断利润。他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游戏规则，比如打牌，前者是普通人凭运气玩，从长远来看胜负的机会是公平的；后者则是少数掌握高技巧的人作弊玩必然赢得的游戏。

可见，资本主义经济是处于最上层的经济，而且是一小部分特权人物的经济。这一小部分人在等级社会中同时也处于统治阶级的地位，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一开始便与国家机器勾结在一起。资本本义正是借助于国家的支撑，其发展才有了制度的动力，才能使资本主义经济大行其道，并支配处于低级地位的广大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则永远是由处于下层的作坊主、小企业主、批发商、零售商等组成的一种专业分工很细但竞争却很充分的经济。很明显，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包括市场经济。至于人们长时期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混为一谈，是因为两者从中世纪至今总是同步发展的，同时人们经常将资本主义视为经济进步的驱动力，而实际上这

仅仅是一个表象。

这种区分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说明了以往的理论都将资本主义的历史看成是市场经济在各个行业中扩展的历史，因而也就将资本主义经济区分成各个经济部门，而实质上，垄断与竞争、国家性与非国家性、大与小才是今日资本主义国家内经济的真正划分；指明了经济学领域中右派与左派之争，并非是人们想象的关于“自由市场还是国家干预”之争，真正的问题是“谁是国家行动的受益者”，因而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争论；阐明了技术进步首先是对资本主义垄断利润的推动，因此只要资本主义能凭此技术获取垄断利润，它就没有推进技术进步的动力。而资本主义实施技术革命，也是因为市场经济侵占了垄断的地盘。布罗代尔的理论，遏制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盲目热情，并使左翼运动始终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五、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将走向何方？

目前在西方的学术讨论中，有一种说法是，马克思主义已被 20 世纪的历史经验所否定，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崩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特征，历史的发展不可能越出资本主义阶段。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现在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最后阶段，在当今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能换取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替代品。英国肯特大学教授肖恩·塞耶斯指出，资本主义出现了马克思所没有预测到的重要转变，它在经济上获得的成功和政治上的民主制，比马克思和其他早期社会主义者所预想的更加具有生命力，并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制度。在他看来，“全球化”的术语非常确切地描述了近几年资本主义体系发生的根本变化。自从 1914 年以来，全球第一次被单一的经济体制所笼罩，全球市场已成为一种无孔不入的力量，至少目前还看不到在全球范围内向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挑战的全球运动的前景。他提醒人们，“如果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要继续地适用于当今的世界，就必须考虑到这些新情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